

中美關係作為當今世界最重要的一個雙邊關係，其發展狀況對中美兩國與世界局勢都有重大的影響。然而，如何衡量和評估中美關係的狀況呢？“橫看成嶺側成峰”，不同的視角會有不同的感知。近來，由於經貿摩擦的直接負面影響，人們對中美關係的感知就像過山車似的跌入低谷。不少人認為特朗普發動的經貿摩擦只是針對中國，就是要以此遏制中國的和平崛起。有人認為當前中美關係進入了1972年以來的最困難時期，維持中美關係過去40年正常交往的政治基礎已經蕩然無存，中美關係將進入長期的、非常動蕩的、充滿對抗的不確定時期。

果真如此嗎？筆者認為，這是對中美關係的片面感知，是過分夸大了當前中美關係的消極面。我想談三點不同看法。

**第一，特朗普發動的經貿摩擦不僅針對中國，其影響是有限的。**

截至目前，特朗普已入主白宮6個多季度了，近兩年來，貌似“無厘頭”的特朗普在內政外交方面動作頻頻，推出了一系列富有“特氏風格”的政策措施，我稱之為特朗普“新政”。發起經貿摩擦屬於特朗普外交“新政”的舉措。特朗普以“美國優先”為幌子，強調“無條件的對等”與“絕對自由”。所以，他反對照顧中國在WTO框架內特殊的發展中國家身份，反對給中國的市場開放以時間周期表，要求完全對等的國際貿易額，否則，就以徵稅來威逼。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發動的經貿摩擦不僅針對中國，也針對歐盟、日本、加拿大、墨西哥、土耳其等國家與地區，只不過針對中國的更嚴厲、更高調些。這主要與中美貿易逆差是美國所有貿易夥伴中最大的有關，美國對華貿易逆差將近佔美國的對外貿易逆差的70%。

從選舉政治角度來看，特朗普對華發動經貿摩擦，是為了兌現其競選承諾。據不完全統計，作為商人出身的總統，特朗普競選承諾的政策兌現率較高，幾乎達到80%以上，這是1952年美國總統選舉以來最高的一個。他在競選時所發出的承諾，絕大部分都很快兌現了，但唯獨在中國問題上“失信”了。特朗普在競選時曾對中國發過“狠話”，例如，他說“中國是匯率操縱國”，“中國人偷了美國人的工作機會”，“要對中國商品徵收45%的關稅”等等。但這些政策主張在特朗普執政的第一年都沒能兌現，其主要原因是習近平主席的雄才大略打亂了特朗普的執政節奏。2017年4月習主席赴美參加“海湖莊園”會晤，並邀請特朗普在當年11月訪華，這些外交舉措都成功地延遲了特朗普競選時對華政策的兌現。但隨著特朗普執政的延續，以

及刺激國內就業的需要，他開始發動經貿摩擦來兌現他的競選承諾。

然而，中美經貿摩擦的影響是有限的，我們不應過分解讀。這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經貿摩擦涉及的經濟份額與當前龐大的世界經濟規模相比，所佔比例不大，無法撼動世界經濟的發展大局。(二)特朗普政府為了滿足國內選舉政治的需要，傾向於自吹自擂，故意擴大經貿摩擦的影響，企圖讓外部世界產生恐慌效應。

從目前統計數據來看，特朗普對華發動的經

## 林宏宇：世界需要一個行穩致遠的中美關係

貿摩擦主要涉及110億美元的太陽能光伏板、洗衣機、加拿大圓木，400億美元的鋼材和鋁材，1920億美元的汽車，還有2500多億從中國進口的產品。到時中國採取報復措施，總額也超不過1400億美元，歐盟、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報復最多也就200多億美元。這些全加一起不到6500億美元。這些商品即使都按照目前的最高稅額——25%徵稅，也不過1600多億美元。這與全球每年80萬億美元的GDP相比，微不足道。按照世界銀行的數據，全球GDP每年平均增長約3%，加上2%的通脹，2018年全球經濟總量應增加4萬億美元。如果把這額外增加的關稅1600億美元置入對比，也僅佔4%，不能對全球經濟走勢產生決定性影響。同樣，即使特朗普對所有來自中國的5000億美元商品徵收25%的關稅，也無非1250億美元，這與我國12萬多億美元的GDP規模相比，也不能產生決定性的影響，至多給我們的經濟發展造成些許拖拽。而且，從短期來看，中美經貿摩擦雖可能迫使美國資本回流，有助於特朗普創造國內部分就業機會，但從長期來看，它是把雙刃劍，將會加重美國的國內生產成本，增加美國國民的生活成本，從而降低美國人的生活福利，可能逼迫特朗普對此貿易政策做出反思與調整。

**第二，儘管當前中國和平崛起的國際環境有所惡化，但中美關係的戰略合作基礎面還在。**

中美兩國作為當今世界最重要的兩個大國，其戰略合作的基礎面很廣，除了中美關係的“政治基礎”之外，還應該有“非政治的基礎”。所謂的“政治基礎”主要聚焦於國際安全、政治外交與意識形態。這在冷戰時期表現得最清楚，就像冷戰時期中美關係的穩定與發展得益於共同的安全對手——蘇聯，國際安全與政治外交因素無居於首位。冷戰結束後，國際安全與政治外交因素的作用大幅下降，而非政治方面的因素逐漸上升。因此，我們別

忘了中美關係之間還有“非政治基礎”因素，即共同的全球責任與共同面對的全球問題（如氣候變化、能源安全、糧食安全、恐怖主義、傳染性疾病、國際移民與難民等問題）。在這些問題上，需要中美兩國協同合作，因為我們只有一個賴以生存的地球。

另外，當前中美關係儘管在傳統的“政治基礎”方面有所削弱，但也不是完全消失了，發展市場經濟的意識形態依然是中美兩國的基本共識，只不過美國方面覺得中國做得不夠。但是，“非政治

基礎”因素依然保持強大的存在，儘管特朗普試圖以狹隘的“美國優先”來修正，但這是不以個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存在。所以，如果我們從這個視角來看，未來中美兩國還是需要合作共存的，中美戰略合作的基礎面還在。

**第三，過分夸大當前中美關係消極面會把中美關係往壞的方向推。**

中美關係很特殊，它從來不是建立在共同的價值觀念與意識形態的基礎之上的。中美雙方因為歷史文化與社會制度的巨大差異，中美關係的發展需要營造良好的合作氛圍，也就是需要人為的“塑造”。縱觀中美建交以來的歷任美國總統，從試圖恢復與台灣“正常關係”的里根，到指責“從北京到巴格達的暴君”的克林頓，再到把中國定義為“戰略對手”的小布什，再到“重返亞太”的奧巴馬，都在不同程度上影響了中美關係。過分宣揚中美關係的消極面會導致負面悲觀的氛圍，從而導致中美關係發展的更大困難。不同的塑造與引導，會產生不同的效果。尤其是遇到類似特朗普這樣對美國外交、中美關係不甚瞭解的美國總統，更需要我們的主動塑造和引導。如果說，特朗普現在的“胡來”是對中美關係戰略意義的無知與忽視，那麼部分反華的美國建制派精英則是有意而為之，故意惡化中美關係的氛圍。如果我們也隨波逐流、無所作為，跟風夸大中美關係的消極面，那麼中美關係就會出現更大的麻煩。

誠然，當前中美關係很困難，但是，再困難，能有1989-1992年困難嗎？當時中美兩國幾乎要斷絕來往了；再危險，能有1999年“炸館事件”與2001年“撞機事件”時危險嗎？當時中美之間幾乎面臨衝突甚至開戰。有人說特朗普把中國定義為“戰略競爭對手”就是突破了中美關係的底線，其實這無非是特朗普在炒冷飯，因為2000年競選時小布什就把中國定義為“戰略對手”了。還有人說，

## 中美之間，“戰爭”可以避免——華盛頓需掂量十個重大問題

如果說中國的對美戰略過去40年來一直保持總體穩定的話，那麼現在美國的對華戰略回應發生的根本性改變是什麼？在2017年12月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今年1月的美國《國防戰略報告》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在7月美國國防部有關未來國防製造、工業和技術需求的報告中，我們可以看到；在10月美國副總統彭斯的演講中，我們同樣可以看到。

**美國的意圖**

如果我們對上述美國各種報告中聲明的意圖加以提煉，可以歸結如下：

第一，1978年以來的中美“戰略接觸期”，未能在中國市場給美國企業出口和投資帶來足夠的開放度；中國沒有在全球基於規則的秩序中成為“負責任的利益攷關者”，而是正在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不同秩序；中國的國內政治沒有變得更加民主。

第二，除上述情況外，中國現在有意將美國擠出東亞和西太，最後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經濟霸主。

第三，中國尋求在國內和國際上壓倒美國；通過中國政府主導的產業、出口和對外投資戰略，掏空美國製造業和科技產業；通過一系列經濟和財政措施，激勵和引誘美國的盟友、朋友和盟友；快速擴大中國的軍事存在，從東海、南海到印度洋沿岸國家以及紅海的吉布提。

第四，上述諸因素再加上俄羅斯，代表著美國未來安全的核心戰略挑戰。這決定了美國戰略方向亟須改變，從“戰略接觸”轉向一個新的時代，即“戰略競爭”。

第五，美國這種對中國國力、意圖和行為的最新分析，從現在開始將轉變為一種新的多維度實踐策略，目的是對中國的外交、軍事、經濟、援助和意識形態的對外擴張予以阻擊。

若上述對華新戰略逐步反映在未來美國的政策實踐中，那麼2018年無疑代表著中美關係在根基上斷裂的開始。

**對未來戰略的考量**

美國在醞釀如何實施其對華“戰略競爭”新策略時，需要考慮很多可能的因素。美國的盟友也需考慮這些因素。

首先，美國的戰略預期是什麼？如果中國不按彭斯演講勾畫的要求照辦，華盛頓怎麼辦？如果態勢朝相反方向發展，後果是什麼？可以推測，美國已經從外勢降級、危機管控和最終衝突等方面模擬了外交、經濟和軍事上可能出現的情景。美國的盟友也需要仔細考慮各種情況與選擇。

第二，如果我們現在處於戰略競爭階段，新的“遊戲規則”是什麼？華盛頓如何與北京就規則內容達成共識？或者，沒有規則？由競爭態勢塑造規則？現實情況是，40年的中美雙邊戰略接觸後，管控雙邊關係的文化、習慣、規範以及規則已經成為

幾代政治、外交、軍事和商業人士的“第二天性”。如果我們委實處在一個勇敢新世界，需要什么規則，來避免海上、空中意外？網絡攻擊、核擴散、在第三國的戰略競爭、購買和出售美國國債以及其他重大的政策領域呢？還是美國已得出結論，中美進入雙邊關係無規則的戰略“新紀元”不會有損失？

第三，中美之間是否依然有存在共同戰略話語的可能，使兩國有可能為雙邊關係的未來設定概念參數？作為一種概念，戰略接觸暗含一系列相互義務。美國現在認為，中國已經從根本上違背了這些義務。但是，在缺少新規則或者共同的概念框架管控雙邊關係的情況下，該如何及時防止（兩國）從戰略競爭滑向脫軌、遏制、對抗、衝突甚至戰爭？如果歷史可以借鑒，這樣的滑動之快，可能超乎任何後現代政治家的預期。1914年夏天一件小事引發的局勢降級令人警醒，當然核時代的戰略算計也在修正傳統歷史經驗。

第四，如果美國的戰略規劃者正在考慮，對華戰略競爭可能演變成全面遏制、全方位經濟脫軌，甚至第二次“冷戰”，那麼我們需要分析一下喬治·凱南的理論。凱南認為若遏制得當，蘇聯最終可能會因為內部壓力解體。然而，如果認為中國在同樣的遏制政策下最終會因內部矛盾而瓦解，則是誇張的假定。考慮到中國經濟的恢復力、從美國其他敵人那里獲得能源的能力、管控政治和社會生活的能力以及各種新技術提供的新潛力，中國不會垮掉。

第五，美國已經確信日益崛起的中國國家資本主義模式是對民主資本主義（不管是保守、自由還是社會民主資本主義）的一個強有力的理念挑戰？蘇聯曾建立起自己的意識形態陣營。但有證據表明中國在第三世界如法炮製嗎？

第六，我們看到，中國通過“一帶一路”，以及貸款和援助對世界範圍內的大量項目作出金融承諾與支持，美國準備提供類似的金融承諾與支持進行戰略反制嗎？上周美國對世行增資的支持是一個受歡迎的進展，但增資額與“一帶一路”的規模相形見绌。

第七，除了優惠金融和貸款援助，還有一個更大的問題，即美國如何與中國在亞歐的貿易和投資體量進行競爭。鑒於中國在亞太和歐洲已經是比美國更大的貿易夥伴（因此也具有更大的政治

和經濟引力），美國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TPP）和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關係協定（TTIP），將如何影響美國與中國在上述地區貿易和投資的相對分量？

第八，基於此，美國到底有多自信，認為自己的盟友和夥伴會全然擁抱它的對華競爭新戰略？美國持續公開攻擊德國、英國和加拿大等盟友以及整個北約，加上對日本和印度徵收關稅之後，還會篤信這些國家會支持它的反華新戰略？或者說，這些國家和地區會繼續觀察中美力量對比和戰略互動，並在之間搖擺？此外，東南亞現在是中美戰略影響力新的“大搏奕”戰場。還有中東，中國是其油氣的更大市場，已經超過了美國。

第九，是什麼讓美國的新理念對世界其他國家有吸引力，以支持美國對華新戰略？彭斯的演講

清楚且有意識地傳達出美國的利益和價值。但這番演講沒有呼應國際社會共同的利益和價值。歷史上，國際社會與美國共享這些相同的利益和價值觀，並體現在美國戰後主導的秩序中。但現在，國際社會目睹特朗普政府以“美國優先”為名，拋棄了這種秩序的諸多關鍵要素（人權、多邊貿易體制、氣候變遷、國際刑事法庭、聯合國多邊援助機構等）。

最後，還有一個更迫切的問題，就是中美關係出現的重大裂痕，對全球經濟及應對氣候變化行動的影響。考慮到全球供應鏈的重要性，若因用激進方式實現兩國經濟脫軌，導致雙邊貿易銳減或者垮塌，這會對美國2019年經濟增長以及全球增長有何影響，是否會觸發全球經濟衰退？同樣，鑒於本月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剛公佈的全球氣候變化報告指出，因為世界主要溫室氣體排放國的行動不足而讓全球面臨潛在災難，如果中國只能憑藉自身力量減排，後果將是什麼？

美國的其他決策者尋求細化特朗普時代對華戰略競爭時，上述是他們應該考慮的10個重大問題。我們如今正在未知的水域里航行，我們不想看到意外後果發生，尤其是危機和衝突。100多年後，1914年的警告依舊在我們耳邊迴響。

今天，對美經濟戰或者武力對抗都不符合中國利益。中國知道自己依舊沒那麼強大。但在退無可退之時，事情會發生變化。民族主義可以成為一股強大的力量，常常無視任何經典戰略邏輯。

當前美國的建制派精英都很反華，其實不然，美國社會是多元的，誰也不敢說他就代表美國了。建制派精英也是多元的，有反華的，也有知華的，我們不必過分悲觀地以偏概全。就像當前中美經貿摩擦中，美國國內既有支持特朗普的，也有反對特朗普的。例如，根據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發佈的《2017年度美各州對華出口報告》，2017年中國是美國46個州的前五大貨物出口市場之一；2017年每個美國農民平均向中國出口農產品1萬美元以上。另據中國商務部統計，2016年美國企業實現在華銷售收入約6068億美元，利潤超過390億美元。2017年美系乘用車在華銷量達到304萬輛，佔中國乘用車銷售總量的12.3%，僅通用汽車公司在華就有10家合資

企業，在華產量佔到其全球產量的40%。美國高通公司在華芯片銷售和專利許可費收入佔其總營收的57%，英特爾公司在中國（包括香港地區）營收佔其總營收的23.6%。2017財年，蘋果公司大中華地區營收佔其總營收的19.5%。顯然，這些美國人會支持特朗普對華發動經貿摩擦嗎？他們可能成為我們爭取的中美關係正面的塑造力量。

縱觀中美關係發展的歷史進程，可以發現中國自身的發展變化，在很多時候是影響中美關係的關鍵變量。例如，1969年中國發出改善中美關係的積極信號，促進了1972年中美關係堅冰的打破；1978年中國決定開啓改革開放的大門，促進了1979年中美關係的正式建交；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中國的積極主動應對，促進了中美在G20框架內的積極合作。可見，中國完全可以在中美關係中扮演主動塑造角色。從目前中美關係發展狀況來看，中國依然可以有創意地有所為、有所不為，主動塑造中美關係的正面走向。

總之，中美關係很特殊，它從來就不是平穩發展的，跌宕起伏、峰迴路轉是常事。因為中美兩國畢竟是兩個體量巨大、歷史文化傳統、價值觀念、意識形態、社會制度迥異的兩個巨型國家，差異與矛盾應該是常事。明年就是中美建交40周年，即將步入不惑之年的中美關係，也將逐步進入沉穩期。如果我們變換個視角，就會發現當前中美關係的緊張，無非是中美關係發展歷史長河裡來多漩渦中的一個，只不過由於多種因素的疊加（如經貿摩擦問題、台灣問題）而顯得格外劇烈。但是，中美關係非常重要，我們需要“理智”——理性+智慧，即使對方“胡來”，我們也不能過度夸大當前中美貿易方面的緊張關係，不宜過分夸大中美關係的消極面，否則會適得其反。（作者系華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院長、教授）

中美關係性質的改變很大程度上是結構性的：首先，因為中國現在的全球和地區體量，從經濟和軍事上都達到臨界值，重寫中美關係是結構上的必需。其次，這兩個世界最大經濟體和軍事強國還在理念傳統和未來志向非常不同。

此外，在過去10年里中國的全球和地區政策發生了顯著變化。今天，核心的問題是理性判斷中國的前進軌跡，美國對華政策的新目標是什麼，以及美國未來如何做出戰略回應？在這種語境下，玩政治指責遊戲沒有任何益處。

**可以避免的“戰爭”**

我很清楚，在目前緊繃的政治氣氛里，中美學者面臨的環境比以往更困難。某種觀點的支持者會被冠以各種標籤，比如“中國經濟者”，甚至是“熊貓擁抱者”。而另一種相異觀點的支持者則被稱為“戰爭販子”。我們必須警惕新的麥卡錫主義。最近，我發現，當我們想要解釋中國崛起的複雜性時，就會被斥為搞反美活動（或者反澳活動）。簡單的答案（或者說站隊）似乎更受待見。但正如我反復提醒，客觀而言“中國崛起”絕非一個簡單問題，任何簡單的回答都是智力上的懶惰和道德上的不負責。

令人擔心的是，目前在美國和澳大利亞，就中國問題進行公開、深入辯論的空間在縮小。越來越多人會提出“你到底站在哪一邊？”這個以前從未宣之于口的問題。嘩眾取寵的做法顯然簡單廉價。真正有價值的是，思考出什麼才是長久、可靠的公共政策，能夠實現共同商定的目標，長遠保持自由、繁榮和可持續，同時不會產生預期之外的後果。尤其是危機、衝突或戰爭。

在當下美國展開有關中國的大辯論的背景下，我總是禁不住想到亨利·基辛格博士的睿智忠告。在亞洲協會政策研究院成立之時，曾向他請教我們的責任應是什麼。基辛格一如既往地娓娓道來：我們需要從三個角度來審視世界：第一，到底發生了什麼？第二，為什麼會發生？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我們忽略了什麼？

如果要問在眼下關於中美關係的討論我選擇站在哪一邊，我的立場是：中美之間，戰爭可以避免。我站在“難道除了投降或對抗，就沒有幫助我們避免踏入修昔底德陷阱的第三條路？”這一邊。

為了這一目標，在目前的關鍵階段，政策圈和學界負有特別責任，去儘可能多地講清楚我們所看到的，而不是火上澆油。要講清楚，我們就有必要換位思考，通過對方的視角觀察現實，哪怕我們可能不贊同。

眼下，沙文主義更容易流行，而紮實的戰略和良好的政策卻彌足珍貴。我期待有更多善者智者，貢獻智慧探索方法，幫助我們度過這個最典型的當代安全困境。